

可与《诗经》共白头



视觉中国供图



当吟唱声起,《诗经》便从古老的文字中苏醒。30多年前,当刘冬颖首次听见《诗经》,那些曾被束之高阁的诗句,倏然便有了血肉与温度,从此,她与《诗经》开启了一场漫长的对话。

《诗经》最动人的力量,在于它真诚地直面着无数古今相通的生活与情感。如今,已成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刘冬颖又将《诗经》唱给更多人,让更多人爱上这位可与之“白头到老”的,可亲可感的古老朋友。

本报记者 肖雅文

从书本里“站”起来 真正走近了我

读书周刊:您第一次听到《诗经》被唱出来是什么时候?当时的感受如何?

刘冬颖:在大学的一次同学聚会上,有个同学夸赞他的老师傅道彬先生才华横溢,我特别好奇,就跟着去旁听了一节他的课——中国诗学。那天傅道彬先生恰好讲到了《诗经》,谈到动情处,先生便唱了起来:“彼黍离离,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,中心摇摇。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,此何人哉?”

那是1994年,《诗经》第一次从书本里“站”起来,真正走近了我。

读书周刊:在这之前,《诗经》在您心里是什么样子的?

刘冬颖:在此之前,《诗经》更像是教科书里端庄却遥远的经典,是文学史上必须背诵的篇章,字句虽美,却隔着一层玻璃罩,让人感受不到它的温度。直到亲耳听到傅道彬先生将《黍离》吟唱出来——那不是寻常歌唱,而是带着古调、满含情感的咏叹。我仿佛瞬间看见了那片在历史废墟中蓬勃生长的黍稷,感受到了那个徘徊在异国都城、满心茫然的孤独灵魂。

读书周刊:这似乎与您曾说“我与《诗经》,要白头到老了”也是相连的。《诗经》中的哪些内容让您觉得可以一读再读,读到“白头”?

刘冬颖:《诗经》就像一部“人生百科全书”,容量足够大、层次足够丰富,所以能常读常新。

年轻时,会为“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”的直率心动,也被“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的朦胧美所吸引,那时偏爱爱情里的热烈与浪漫。人到中年,经历了更多聚散离合,扛起

更多责任,再读“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”,对亲情的理解就变得深沉而具体,不再是空洞的字句,而是切身的体悟;面对困境时,也能与“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”的孤独感深深共鸣。尤其是《小雅·蓼莪》中对父母恩情的追思,随着年龄增长,每读一次就被刺痛一次。它能在你人生的每个刻度上,都给出回声,穿越千年时光,持续给予理解、慰藉与力量,这样的经典,自然值得读到白头。

能“玩”在一起的古老朋友

读书周刊:平时教学中,年轻人愿意靠近《诗经》吗?

刘冬颖:年轻人不是不愿靠近《诗经》,只是需要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。我平时会用“三千年前的流行歌词”来介绍《诗经》,用现代爱情心理解读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”,这样一讲,他们的眼睛就亮了。

有个片段我印象特别深,讲到《邶风·静女》“爱而不见,搔首踟蹰”时,让同学们分享自己等人时的心情。一个男生笑着说:“这不就是我在女生宿舍楼下等她,她半天不下来,我手机都快搓出火星子的样子吗?”话音刚落全班都笑了。那一刻我特别感慨,古今年轻人的心境原来如此相通。

其实,《诗经》里的生命力,天然能与年轻人的心灵共振。只不过,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仅供膜拜的经典符号,而是一个可以对话,甚至能“玩”在一起的古老朋友。

读书周刊:您的著作《诗经的八堂课》一开篇就讲《诗经》的语言美,不管什么时候读起来都特别亲切。

刘冬颖:《诗经》语言能跨越千年仍动人,核心在于它源于“心声”与

“天籁”,不是刻意雕琢的美,而是生命节奏的自然流淌。那些“关关”“苍苍”“燕燕”“灼灼”“依依”“霏霏”的叠字,是汉语最本真的声音摹写与情感复沓,一出口就能营造出鲜活画面与氛围感;它的四言节奏,像心跳一样稳定又富于变化,自带一种“歌唱性”韵律。

最高级的表达往往最质朴。叠字的密集意象、复沓递进的结构,比如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,正是一种“强画面感”与“情绪递进”,能快速抓住读者注意力。它们直击人类感知的共性,不分古今。

读书周刊:您觉得《诗经》里最核心、最能打动同时代人的精神是什么?

刘冬颖:我认为《诗经》最核心的精神,是“真诚地面对生活”。它不回避人类任何基本处境:劳动的艰辛如《七月》,爱情的甜蜜与痛苦如《静女》《氓》,对不公的愤怒如《伐檀》,对家园的眷恋如《采薇》,对命运的茫然如《黍离》。它既歌颂美好,也记录苦难;既维护礼法,也珍视真挚情感,活得足够真实。

很多诗句放到今天,依然能精准击中我们的心境。比如“死生契阔,与子偕老”,与子偕老的古典爱情誓言,“于嗟阔兮,不我活兮”的分离之痛,“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下的“朝夕从事”与不均之叹……纵使科技与社会结构巨变,人心的快乐、焦虑、渴望与失落,其实亘古如新。

读书周刊:我们听人讲《诗经》,总离不开“礼乐教化”这样的说法。您有没有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角度,可以打破大家对《诗经》的固有印象?

刘冬颖:当然有。提起《诗经》,大家多想到“温柔敦厚”的礼乐教化,但它里面更有鲜活乃至“叛逆”的一面。

一是“礼乐”背景下的鲜活个体。

比如《郑风·褰裳》里的女子,会嗔怪男子“子不我思,岂无他人”,爽利又大胆,尽显那个时代女性的个性魅力。这说明礼乐的作用是引导人走向温润,而非束缚个性、抹杀真情。

二是“边缘者”的声音。《小雅·何草不黄》以“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”“自比,发出征夫“哀我征夫,独为匪民”的血泪控诉,批判力度极强。这些角度能让我们看到,《诗经》不是单一的教化文本,而是充满张力的经典,它容纳了不同阶层、不同情绪、个体的生命热度常常穿透礼乐框架,灼灼照人。

读书周刊:在社交平台,很多人通过您的吟唱认识了《诗经》,“唱出来”对理解《诗经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?

刘冬颖:《诗经》本就是“歌诗”,音乐是它天然的血肉与呼吸,吟唱就是让《诗经》回归本源。文字印在纸上,是沉默的,一旦被吟唱,节奏、旋律、气韵就会一同苏醒。你会发现,《采芣苢》“采芣苢兮,采芣苢兮,采芣苢兮”,原是集集体劳作的节奏;那些“兮”“思”的叹词与句尾韵,正是情绪的自然流淌。真正懂《诗经》,不能只在文字里寻章摘句,更要在声音流转中,感受先民如何将生命感慨“长言之、嗟叹之、咏歌之”。

“吟唱+新媒体”的方式特别适合经典传播,把诗歌变成可参与、可体验、可分享的当代文化产品。其实,无论《楚辞》《古诗十九首》,还是唐诗宋词,都能通过现代音乐、短视频、音频节目等形式“活”起来,关键是找到古典精神与当代审美、情感需求的连接点。

读书周刊:对于第一次读《诗经》的普通读者来说,您最想推荐大家先

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
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
行道迟迟,载饥载渴。
我心伤悲,莫知我哀!

《采薇·节选》

先秦 佚名

读哪几首?能不能说说推荐理由?

刘冬颖:教材之外,我推荐普通读者先读这几首。第一首《郑风·女曰鸡鸣》,堪称绝妙的婚姻生活Vlog,没有宏大叙事,只有夫妻晨间的日常对话:妻子催丈夫起身,丈夫有点赖床,接着约定共享美食、琴瑟和鸣,把平凡婚姻里的温情与趣味写得淋漓尽致。

第二首《王风·黍离》,即便不懂周室衰亡的历史背景,也能被“行迈靡靡,中心摇摇”的茫然,以及“知我者,谓我心忧”的孤独感击中,这是人类面对沧桑巨变与不被理解时的普遍心境,容易引发共鸣。

第三首《小雅·鹿鸣》,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”,以鹿群伴吟共食起兴,描绘了宴飨宾客的和谐场景,满是礼敬与欢洽,是理解《诗经》礼乐文明的绝佳入口。

读书周刊:如果想进一步拓展对《诗经》的理解,您能再推荐几本好书吗?

刘冬颖:汉代《毛诗郑笺》(郑玄著)是古文经学的权威注本,是探寻《诗经》原始面貌与教化功能的根本典籍。清代方玉润的《诗经原始》(李先耕点校),则突破汉宋经学陈说,“循文按义”推原诗人本意,屡有新见,极具个性。

当代的《诗经评注》(王守谦、金秀珍著),兼顾训诂与文学赏析,平衡了学术性与可读性;扬之水《诗经名物新证》,结合考古文物与文献,考辨草木、器物等名物,能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《诗经》里的世界。我想,从这些篇目和书籍入手,就能发现《诗经》之门后,是一个鲜活、深情又广阔的天地。



决战时刻显身手

吴石好友吴仲禧,是我们党人的心脏布下的一颗“冷棋子”。在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刻,这颗“冷棋子”在吴石多次经意、不经意间的关键性帮助下走活了。吴仲禧在回忆吴石时以感激的语气写道:“1947至1948年间,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步起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吴石知道我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,也就主动为我提供条件,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。”

吴仲禧 1937年7月成为中共特别党员,已卧底敌营10年,一直潜伏在敌人的心脏。1946年1月,军法执行监部宣告撤销,他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。这时他已与在上海的中共特别党员王绍懿恢复联系,他要到上海面谈,届时具体安排工作。4月,他怀着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请求去延安学习的愿望,悄悄从广州到达上海。

当他去沪之前,曾向左洪涛(中共特支书记)透露过自己的意向。左托他带一封密信给当时在南京、内战的周恩来,后来获知内容是请示在内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情况下,特支人员的去留问题。周恩来接信后,当即指示:“相机撤退。”约两天后,经王绍懿安排,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在王的家中同他连续谈了三个晚上。

潘明确告诉吴仲禧:内战必将扩大,不可避免。现急需将你的军事情报,这项工作不是一己个人所能做到的,还是暂时放弃这个想法,最好能在国防部内部找个实职,以便搜集蒋军的情报。吴仲禧明知这是一项十分艰难、危险的任务,但还是接受党的派遣。他当即从上



冷月无声 吴石传

郑立著

海启程,赶往南京找吴石设法在国防部内谋取职务。

吴仲禧到南京时,吴石已是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局长。走进吴石并不宽敞的办公室,两位好友久别重逢,格外高兴,落座后就天南地北聊起来。

闲聊中,吴仲禧提出:“虞薰,军事参议院闲散无聊得很,最好能在国防部内谋一个实职。”吴石考虑了一下,为难地表示:“奋飞,这事还不好办。国防部名义上由白崇禧当部长,实权还是操在陈诚总长手里,需报蒋委员长核准。我先帮助联络,你回去等。”有一消息,会上告诉你。”这样,吴仲禧辞别吴石后,就购车票回广州家中静候消息。对于好友的交代,吴石热心帮忙,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,经过多方周旋,9月,终于为吴仲禧谋到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一职。接到消息,吴仲禧作了认真的思考。在他看来,监察局里的职位虽不直接掌握军事机密,但可以靠这个牌子在南京活动,并有机会到各地巡察,视察到上海,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,即赶到上海,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

系,征得同意后,穿上军装,急匆匆赴南京上任。

吴仲禧发挥作用的机会来到了。1947年6月30日,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指示,司令员刘引向、政委邓子恢率领军黄鲁豫豫战军12万人南渡黄河,向大别山挺进,揭开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。刘、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,党组织迫切希望他能从“华中剿总”处了解蒋军的第二线兵力,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抽调投入前线,以作战略决策参考。吴仲禧在上海接到这一指令后,当即赶往南京,住在吴石家中设法探听。在吴石家中,适逢“华中剿总”情报科长胡宗宪来

一看,这份旬报虽只有32开本八九页,但内容包括国共双方的部队番号、兵力、主攻姓名、战斗损失等项,既有文字简述、判断,又有态势要图、统计数字等,正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的难得军事情报。他边看边说:“这些材料对研究战略、战术太有帮助了。”胡宗宪只知道吴仲禧是吴石的挚友,也是同道,却不知道吴仲禧的真实身份,加上在柳州时就相识,看吴仲禧这样认真一页一页地翻阅,冲着吴仲禧说道:“吴长官如有兴趣,待我回武汉后也寄送吴长官一份,请多指教。”吴仲禧喜出望外,当即通讯地址写给胡宗宪。后来,胡宗宪将每期作战态势旬报,寄到吴仲禧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吴群敢处转交,直至1948年底都没有中断过。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,这是正式编印、书面的第一手情报,并有连续性,蒋军情况经核对属实,旬报中对我军的判断亦很注意。当时在上海负责联系吴仲禧的刘人寿常去电话探询收信情况。1948年夏,刘人寿离沪在香港述职期间,还特意介绍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妻子黄景荷定期前去取回信件。

1948年6月,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。不到一个月,就被派往“徐州剿总”服务。前一天,他专程到香港请示上级蒋汉年、张唯一。当时“徐州剿总”总司令是刘峙,副总司令是杜聿明,参谋长是李树正。李树正是吴石的学生,李树正在柳州曾任第四战区参谋处长,与吴仲禧面熟。为了完成使命,吴仲禧途经南京时,请吴石写信带交李树正,吴石在亲笔信中告诉李树正:吴仲禧将自己多年的同学、好友,请多加关照,给予方便。酷热的9月,经过一路的辛苦,吴仲禧到达“徐州剿总”司令部。